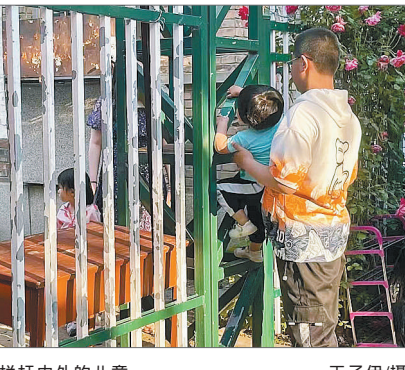


# 童年的另一种方式



栏杆内外的儿童。 王子伊/摄

□ 王子伊

体验，他们的感知方式、交往方式和娱乐方式，注定有所不同。

打个比方，我妈是70后，她的童年由收庄稼、割猪草和挖野菜构成。我是00后，我的童年由跳皮筋、吃辣条和到处乱窜构成。上小学三年级的小侄女是10后，她的童年由上网课、做核酸和不时隔离构成。她和小朋友打招呼的方式，不是下回一起和泥巴呀，而是我们下次核酸见。

相约一同对着熟悉的陌生人龇牙咧嘴，展示牙齿、舌头和喉咙。

有天我提议，咱们去玩吧，去海边玩水、堆沙子。小侄女第一反应是，不行，危险，有疫情。我不死心，搬出无确诊病例的证据。小侄女又补充，她父亲的工作单位有明确要求，不允许出京。你想去吗？我问。对方愣了愣，最后点点头：想啊。

一位大学老师，曾在课堂分享过自家娃的一幅画，作品的主题是“未来世界”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朝气蓬勃得都晃人眼，画面里洋溢着儿童旺盛的想象力。只不过，一个细节让人不能忽视：娃在“未来公园”门口画了一个牌子，是个二维码。

小朋友们似乎在疫情中提前长大。有些孩子，也许不知道：原先，人与人的距离可以比一米更近；口罩不是出行的必备用品；人们能在商场与自己的家之间自由地出出进进；具体的大自然、小伙伴可以比电子屏幕更有吸引力。

他们的日常生活被改变，心理健康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。有研究发现，疫情作为负性生活事件的应激源，会对大脑产生

作用。人们可能会出现抑郁、焦虑、恐惧、失眠等各种生理及心理应激反应，而孩子作为特殊群体，处于身心发育阶段，受外界干扰的可能性更大。

国外一项研究表明，85.7%的家长报告停课期间孩子的情绪状态发生了变化，常见症状是注意力不集中、无聊、易怒、烦躁和紧张。国内学者赵祿雷对396名8-18岁在校学生进行分析，发现疫情期间有22.0%的青少年患有焦虑性情绪障碍，比非疫情期间青少年患病率高出4.1%。

一个更显而易见的影响是，拥有扇风耳的小朋友也许越来越多了。一项2020年的医学期刊研究发现：部分带弹性耳挂的外科口罩或成人口罩，会导致耳廓软骨受压。持续佩戴这样的口罩数

小时，还会导致耳廓后皮肤出现红斑和疼痛性损伤。青春前期儿童耳软骨还没发育完全，上学时若长时间佩戴不合适的口罩，容易影响外耳的角度和正常生长。不仅如此，成人口罩的透气阻力远大于儿童，可能会导致儿童呼吸不畅。所以，专家建议家长应根据孩子年龄选择对应的儿童口罩。

宏观如公共政策方面，应加强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，微观如家长在感知层面，帮助孩子正确理解世界和国家正在发生的疫情，解释其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变化，鼓舞他们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；在行动层面，不让电子屏幕代替陪伴，在防疫的前提下，多进行亲子活动，与大自然接触，最大限度为他们提供一个自由自在、完整充实的童年。

## 安迪·沃霍尔：当代艺术的河神

□ 陈之琪

如果你有意触摸当代艺术，那你或许绕不过安迪·沃霍尔。他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与引领者，更是摄影师、制片人、音乐人。沃霍尔的生命停止在互联网犹在襁褓的20世纪，但那时候他就作出大胆预言：每个人可能都在15分钟内出名，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。今天，这个预言不仅成真，甚至在短视频时代被缩短为15秒。

从不落伍、依旧流行。应当承认，安迪·沃霍尔是幸运的。他在自己酣畅淋漓进行创作时就大红大紫，把艺术变成商业收入，又让艺术汇入商业的洪流，他是当代艺术的河神。

1961年，安迪·沃霍尔受友人启发，将创作目光着眼于身边事物。他尝试画了一个被挤压过的金宝汤罐头，牛肉面味儿的，随后完成了他符号性的第一批波普绘画代表作。

《32罐金宝汤罐头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画。安迪·沃霍尔的整个创作流程就像是在工业流水线上制造一个个真罐头。他借助丝网印刷技术大批量复刻原图，让每一张画的轮廓都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具体图案有些许差异罢了。

复制是艺术吗？机器是艺术吗？艺术的主角可以不圣母、不是原野，却可以是多种口味的廉价罐头吗？

某种程度上，来自艺术界的尖刻质疑和反对声浪，不只是对安迪·沃霍尔的猖狂之作，还是对当时美国的消费主义进行挖苦与嘲讽。然而，沃霍尔没有后退。年轻的他用最朝气蓬勃的姿态迎接着美国消费主义的狂热洗礼，越是被质疑、被讽刺，他越是发现并坚信着一切皆美。

安迪·沃霍尔一直认为，大众消费品一定存在某种艺术血统，或者他们就是当代艺术本身，和空旷展厅中一幅价值百万的油画不该有区别。

沃霍尔决心将艺术拉下神坛、赶到超市货架上去。巴黎水、苹果电脑、绝对伏特加、香奈儿纷纷与沃霍尔展开合作，于是许许多多的商品包装，都成为安迪·沃霍尔的艺术衣裳。

无论是在安迪·沃霍尔那个工业化技术蓬勃发展的年代，还是如今信息化洪流、大浪淘沙的互联网时代，人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，以新媒体为载体，源源不断接受着当代艺术的兼容并蓄。

按照传统艺术形式的鉴赏体系，要想欣赏梵高或莫奈的油画，我们或许要有安静空旷的观画环境、充盈充沛的历史知识、扎实的笔触的油画鉴赏技巧。只有在艺术敏感的全副武装之下，才能将艺术品置于某个时空坐标系中进行品评。

然而，如今置身于当代艺术的场域，视觉对所有观众而言都是免费开放的，就像美术馆里的冷气一样，是无门槛的。

擦亮双眼的大众不再只是观摩艺术家业已完成的雕塑或画作，只能发出鼓与呼；而是在艺术的视觉传播过程中，与艺术家隔空对话，共同创造、完善了艺术本身。

安迪·沃霍尔曾经说：在东京、斯德哥尔摩、佛罗伦萨，最美的是麦当劳。而北京和莫斯科还没有麦当劳。这个关于麦当劳的说法充满隐喻性质。它暗示着大众为消费主体的艺术和时尚将席卷全球，就像雨后春笋般的连锁店一样。

1982年沃霍尔游览北京天安门，对硕大的毛泽东像和清一色的中山装印象深刻，甚至可以说是好感顿生，他糅合中国元素进行的波普创作还一度卖出市场高价。

但今时今日，北京有的可不只是麦当劳了，波普艺术不仅走进中国、为中国大众所关注，现在，中国大众是拿着手机、连着Wi-Fi，走进了安迪·沃霍尔。一次社交媒体上的转发、分享，就是关于消费与流行文化的一次套娃式的、穿越时空的展示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饱受争议的是消费主义对精英艺术的入侵；21世纪数字时代的到来，当代艺术和网红经济纠缠不休，同样让社会怀疑，究竟是什么是值得尊敬的崇高艺术、什么是商业时代的把戏。

她眼里看到更多的，是人。

(文中王大为可化名)

(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，有删改)

## 鸡窝里的女博士

着一只眼偷看。

站在一旁的王大可研究的课题有些生猛：鸡在不同社交环境下的性行为策略、精子分配策略、认知决策策略。

简单地说，就是从鸡的求偶和交配行为里，研究鸡是如何找对象的。比如，在成年鸡的求偶行为中，雄鸡会通过展示华丽的羽毛来吸引雌鸡。王大可是个90后，她的研究课题，初研究这个课题，是对人类亲密关系有好奇心。

她小时候读文学，书里描绘天鹅对爱情忠贞，如果猎人打死一只天鹅，它的伴侣会马上自杀。但学生物后，她了解到，天鹅的出轨率很高，如果给一窝天鹅蛋做亲子鉴定，大多不是来自同一个父亲。

这成了她动物性学研究的起点。她在一篇研究动物婚外情的论文里找到一位牛津大学导师，申请成为这家世界顶级鸟类研究所的博士生。

更重要的是，她想从动物性学研究中，去理解人类社会。

在她看来，性关系不仅只有伴侣关系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起源于性的发生。性连接起关系的最小单元，才有了家庭、社群、国家。她希望从动物研究里探索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。

这个独特的研究方向能让人一下子记住她。一位牛津同学回忆，刚到牛津时，一群不同专业的同学围在一起自我介绍，她一下子就记住了那个研究动物性行为的女孩，尽管王大可话不多。

她的父母、长辈知道她的研究方向，但凑在一起时，会默契地不提这个话题。有朋友跟她吐露性功能障碍的隐疾，她直接说，从鸡身上观察到的现象无法解答这个问题，建议去看男科。这无异于找兽医给人看病。

她的小学同学回忆，王大可经常会冒出新念头，容易被新事物吸引。她曾被王大可拉着去潜水、听讲座；她高中的化学老师说，与其他忙于应试的同学不同，高中时，王大可常提出与高考毫不相关的问题。有一次，她带着化学课本去找老师问问题，直到离开都没打开那本教科书，而是把她好奇的、与书本无关的问题问了一遍。

她的牛津同学也说，王大可研究过许多学科，甚至在动物学系博士毕业前夕，想去再读个哲学博士。提到她时，周围人嘴里常出现的词是“有趣”“好奇”，不仅形容她的研究，也在概括这个人。

经常有人问王大可：研究这个课题，有什么用？她通常回答，没什么用，只是在拓宽知识的边界而已。

这是一个少有人了解的研究方向：与那些把动物的器官和细胞像螺丝一样拧下的实验相比，她更容易被动物的一些本能行为所吸引。

她早就知道这个研究方向不利于就业，但好奇心驱使着她，在鸡窝里做实验。

大约只有在电影里出现生化危机时，能看到这样的穿着：一套防护服、一双胶靴、自带抽风机的防护头盔，王大可带上记录手册、抓鸡网，严阵以待地进入实验室，并顺手扣上实验室的大门。一旦鸡跑出去，将是极大的实验错误。

在牛津郊区，早晨散步的英国居民，看到全副武装结束实验的王大可，吓得直跑。

一切动物实验都在获得英国动物伦理牌照的前提下进行。王大可要赶在清晨和夜晚，鸡固定的交配时间做实验。夏天，半露天的实验大棚就像一个温室，人待在里面容易感觉闷热。冬天，王大可裹着大棉袄坐在碎石地上，手脚冻僵了，还在一边看着鸡颠鸾倒凤，一边记录实验过程。

鸡窝里最谄媚的公鸡是K48，每次交配后，不和母鸡温存片刻，反而围着王大可转圈。王大可曾以为，这只公鸡很喜欢她，后来发现，K48几乎对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那么热情，研究人员因此乐于用它做实验，它也有了更多交配机会。

一只编号M21的公鸡，在鸡窝里地位一般。公鸡靠打斗能力、美丽的鸡冠吸引异性，打斗能力强的公鸡在群体里等级更高，有更多支配权。有一次，M21见到王大可走进鸡窝，向她发起了挑战。它跳起来，用爪子上坚硬的趾爪击王大可的小腿，然后，开始在鸡窝里神气地转圈，接受其他公鸡的注目礼。

可能对它而言，人就像上帝一样。M21能打人，它在群体里的地位就上去了。王大可猜想，因为这只急切想要证明自我的鸡，她的小腿有了一片淤青。

她的同学跟她去过实验室，见识过她和那群鸡的感情。一些鸡会奔跑着，凑到她跟前，而大多数母鸡对她的到来假装看不见。

王大可解释，实验室里的母鸡数量比公鸡少。因此，公鸡相对更饥渴，更愿意参与交配实验，公鸡看见我就像看见了财神，母鸡看见我就像看见了瘟神。她能从公鸡的叫声，识别出鸡当时的状态。当一只公鸡饱满悠长地打长鸣，喔、喔、喔，那是要展示雄性的风采；当发现虫子或新东西，会发出调较低的咕、咕、咕；当不断扇动翅膀，短促低沉地发出一声哦啊，那就是吆喝其他鸡，一起看交配现场的时候了。

在鸡窝里，霸凌与权力争夺无处不在。最经常出现霸凌，是一只鸡把守着食物和水源，不让另一只鸡吃饭喝水，如果靠近就打它。

还有一次，她做实验时，一只公鸡冲过来，像在求救。还没到王大可跟前，它就筋疲力尽地倒在绿布下，好几只鸡跟过来，骑在那只倒下的公鸡身上。

等王大可赶过去时，那只绿布下的公鸡已经断了气，脖子宣拉着，身体还是温热的。那是王大可最喜欢的一只公鸡，



王大可抱着她的书。 受访者供图

L32，有着金色的羽毛。

这也是一种霸凌。王大可说。

有时，她看着动物的行为，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人类世界。

标号H28的公鸡，经常被其他公鸡欺负，只能待在树上，研究人员看它可怜，把它选为实验的对象。但当它进入实验室，面对一只体型小于它的母鸡时，H28拔光了母鸡的羽毛，撕扯裸露的皮肤，咬去鸡冠，简直是虐待。

真不是个好家伙。王大可从这只鸡上看到赤裸裸的、没有被掩盖的本性，就像某些男人在外受了气，回家对自己的伴侣诉诸暴力。

她对动物的兴趣，远不如对人的兴趣大。但人会说话，也会说谎，难以捉摸，动物的行为更真实客观。而且，她可以设计动物实验的变量，调整研究方向。

她喜欢探索未知，也喜欢介绍她的发现：在网络上写专栏文章，向陌生人介绍动物世界里五花八门的交配故事。她想，喜欢她文章的读者，也是出于人类原始的对新知识的好奇。

新经典人文社科事业部总编辑杨晓燕无意间刷到她的文章，被活泼的文风吸引了，内容也很长见识，当下决定要签下这个作者。

7月，王大可的新书《它们的性》出版。在后记，王大可写道，这本书不是猎奇的各种动物性癖的展示，也非大咖学理的一脉相承，我只是赤裸裸地展示了我的思考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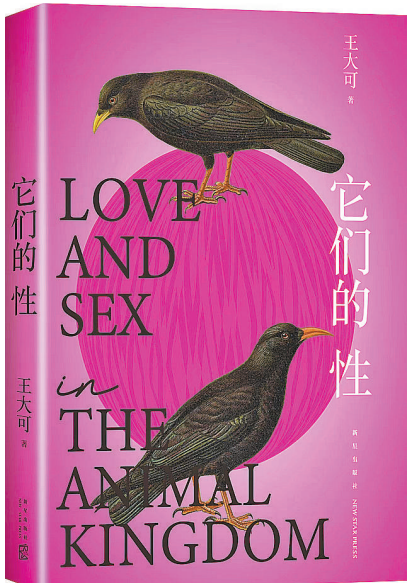
她坦言，自己观察动物时，天然地带有类视角，但人类的观察只停留在动物的行为上，很难真正推断动物的内心。比如，一些动物性成熟了，不去繁殖，反而帮父母带弟弟妹妹，这个现象容易被人类解读为无私，但实际上，如何知道这不是利益驱动的呢？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晞

只有在偷窥香艳场面时，鸡窝里的鸡会如此一致：吃饭的、喝水的、打架的、睡觉的公鸡母鸡纷纷凑到铁丝笼前，旁观实验室里的两只鸡交配。

负责交配实验的是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博士王大可。为了给两只准备交配的鸡减轻压力，她拉了一个深绿色幕布，围在铁笼旁，试图遮挡偷窥者的视线。

这群偷窥狂魔从幕布下方的缝隙里钻出，伸着脖子看；跳上树枝，站在高处看；还有的母鸡把幕布的一角啄破，侧



《它们的性》王大可著 新经典/新星出版社



王大可的画作《哑女人》 受访者供图

更重要的是，在自然界发生的那点事，不一定能推及到人类社会。

牛津大学有对大山雀，是一夫一妻型的鸟类，经常一起觅食。研究人员设计了两个远距离的食物基地，分别给了这对夫妇禁卡，彼此只能进入规定的基地觅食。结果，即使饿肚子，这对大山雀也不愿分开觅食，一方进基地里吃饭，另一方在门外等待。

王大可分析，这并不能说明，这对大山雀夫妇是为了爱而一起觅食的，也有可能其他人类不知道的原因。

慢慢来，在研究动物的过程中，她发现，这些新奇的自然现象，并不能填补成长过程中亲密感的缺失。她曾用进化论解释世界许多例子，但当她在牛津都强奸与性虐待中心做了3年志愿者，接听热线电话后，发现进化论无法解释许多案例，人类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不公，很难在动物研究上获得规范化、价值性的结论。

她的答案只有在人类社会才能找到。她说，用动物研究去解释人类社会的想法，是一次失败的尝试。她想把这些思考的结果作为新书的序言。编辑不同意，两人争论时，王大可还哭过，序是我的命！她想告诉读者，她做动物研究最初是为了了解人类的亲密关系，虽然探索失败了，但这是她自我寻找的阶梯里的一个台阶。

她小心翼翼地揭开自己的伤疤：见过原生家庭里不和谐的婚姻，听过重男轻女的偏见，从小对亲密关系渴求又害怕。小时候在人群里待着，她会突然感觉胃疼，不习惯和人交流。她羡慕的一位小学闺蜜，是那种班里50个人，有40人选她当班长的人。

她画过一幅画，起名《哑女人》，她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，半沉入水里，只能大口呼吸，无法说话，有一种窒息感。她说，在她童年和少年时候，这种溺水的窒息感会时不时涌向她。

她习惯披上了理性的外壳，把未来5年的计划安排清楚，不轻易宣泄情绪，也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需求，明明想吃毛血旺，但是我不说，等到大家都去喝汤了，我又会不高兴。如果导师临时更换了实验计划，她会抓狂。

她的大学哲学老师回忆，有一次哲学讨论，主题是爱，王大可问，爱的定义是什么？她习惯了用概念去解释世界，而不是体会、感受爱。

转变来得很快。上哲学课时，一位老师建议，先从学会表达需求开始，把原来披上的理性外壳卸掉。

她开始学习不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变得不那么理性：上课晚了，她会直接跟老师说，想睡觉了，而不是把电脑开着，直接入睡；她早就不要去计划5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她对动物性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弱，如今，她眼里看到更多的，是人。

(文中王大为可化名)

(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，有删改)

### 图片新闻



8月15日，三亚，在第三方舱医院项目现场，工程人员昼夜不停加紧施工。 视觉中国供图。